

清末废八股后的四书义与五经义^{*}

安东强

内容提要 “废八股、改策论”，不足以准确涵盖清末科举文体改革的全部内容，甚至无法表达张之洞所拟方案的核心内容。张之洞主张调整科举乡会试文体格局，不仅要保留考查四书五经的文体，并将之从头场移至第三场；而且在分场去取程序的配置上，第三场文体将成为最终去取的关键。然而，清廷摒弃了分场去取的考试程序。四书文与五经文在废八股后，更名为“四书义”与“五经义”，一字之差，却解放了应试者的文体束缚。由于没有分场去取程序的保障，四书义与五经义沦为科举考试无足轻重的点缀，无法满足新旧各方的改革期望，最终在废除科举后退出历史舞台。

关键词 张之洞 四书义 五经义 分场去取

清末戊戌（1898）、辛丑（1901）之年科举改制的初衷、进程及结果，时论及后来的叙述往往概称为“废八股、改策论”。这种概括将八股与策问、论两文体平等看待，在强调科举文体变革的同时，至少容易引发两个方面的误解：一是让人忽略文体改革背后的重要内容还在于科举乡会试三场的顺序及格局，二是使人误将废八股与废四书文、五经文等同视之。

有关戊戌前后科举改制与场次问题，笔者已撰文讨论，而对于辛丑改制之后科举新章的实施与停废科举的关系，亦有学者详加论述^①。在此基础上，对清末废八股而保留四书文（义）、五经文（义）的举措，可在制度设计的用意、推行实施的情形及反响、观念与文化各层面的系列反应等方面，进行细致而深入的探讨，从而厘清时论及后人对相关问题的误读。

一 场次调整与文体更名

一般而言，八股文包括以八股程式撰写的四书文与五经文两种文体。《清史稿》称：清初科举（文科）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②。其实，清初乡会试仍分三场：首场试以四书文与五经文，次场试以论、表、判，三场试以策问。明清以来形成了乡会试专重首场取士的阅卷风气，各文体的场次越前，则地位越高；反之亦然。因此，随着清廷损益旧制，五经文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逐渐降低，最突出地体现在场次方面。如乾隆年间定制的乡会试文体格局为：四书文与试律诗并列头场，五经文在第二场，策问在第三场。这也造成一种奇特现象：时人攻击八股，往往针对四书文，而较少及于五经文。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项目编号10&ZD1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清代科举文体与选才观念”（项目编号12YJC751001）阶段性成果。

^① 关晓红《清季科举改革与停废科举》，《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拙文《晚清科举的场次与选才》，《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②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〇八《选举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册，第3147页。

道咸以降,有识之士目睹时艰,针对科举取士的弊病纷纷建言。概言之,各方的用意一是改革乡会试的阅卷风气,不宜偏重头场或反过来刻意抬高二、三场;二是纳洋学于科目,变革文体及考试内容;三是调整乡会试三场文体的场次顺序;四是开特科^①。在此推动下,清廷最终于戊戌、辛丑出台科举新章,即所谓的“废八股、改策论”。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不仅是策、论两种文体在科举考试中地位的抬升,还有四书文、五经文的文体如何变革,及所在场次如何调整。

关于清末辛丑年科举改革的框架,特别是科举场次与文体格局的调整,大体上基于张之洞、陈宝箴戊戌年改革科举的奏议。可是,通行的理解却与他们的本意有不小出入。

张之洞固然主张添加新策、新论,但也坚持保留四书文和五经文。细绎之,他的着眼点还在于改革乡会试的衡文程序,强调乡会试应当分场去取、分场发榜。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初十日辰刻,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电商变更科举乡会试场次与文体,拟改为“第一场考时务策,专问西政西学。二场考中国史学、国朝政治。三场考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其用意是改变此前专重头场的积习,以及个别考官刻意偏重二、三场取士的风气(如嘉道间的朱珪、阮元,同光间的潘祖荫、翁同龢,乃至张之洞本人亦是此风气的推动者),从而使“每场皆有去取,如府、县考,假如乡试头场取一千人,二场取三四百人,三场中式如额,既可得通才,又不废四书、五经文”^②。如此调整之后,四书文、五经文在章程上降为第三场文体,实际上在兼顾三场、分场去取的制度保障下,反而成为乡会试最终一场取中与否的关键,其固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似乎并没有降低。

显然,张之洞在变革文体及考试内容的同时,强调的是科举的场次问题。他不仅不主张废除四书文和五经文,反而保留了其取士与选才的固有地位,甚至在设计新章之初也没有考虑废除八股格式。因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全国少数积极推动维新运动的大员,加之张之洞此时谨慎处世的作风,所以张之洞电商陈宝箴,希望了解陈的看法,如果能获其认可,无疑更加妥当。事实上,张在通电之前,已向陈之子陈三立详谈此议,并请代为转答其意。

两天后,陈宝箴复电张之洞,对调整科举场次与分场去取的用意表示赞同。可是,陈对科举文体方面的主张有所保留,并提出己见:一是建议“以国朝政治、史学移作首场,著尊王之义,而以西人政学为第二场”;二是主张废八股格式,“第三场用《四书》《五经》命题,似宜专以发挥义蕴为主,不用八股格式,摒除浮华排比旧习”。其实,还应当注意到的是,陈宝箴主张废八股的重要原因在于,“时文不废,则书院不能一律改章。若处处另设学堂,则经费难给”^③。换言之,废八股的考虑更在于文体之外,尤其是与书院改章、设立学堂息息相关。

有意思的是,张之洞与其智囊团对于陈宝箴的建议并未全面吸收。他们经过反复斟酌后,吸纳了第一条,即将头场、二场的文体进行对调,却无视废八股的主张,从而形成了“变科举”的改进方案。这个方案或许可以视为张之洞的成熟方案,因为他很快将其写入“意在正人心、开风气”的大作《劝学篇》之中^④。

张之洞处世谨慎,其未采纳陈宝箴废八股的建议,原因或许有两方面。其一,尽管朝野上下关于废八股的舆论汹汹,可是作为清朝取士最重要的文体,既然朝廷尚未表态,因此他也按兵不动;其二,

① 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晚清科举的场次与选才》。

② 张之洞《致长沙陈抚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十日辰刻发),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9册,第311页。

③ 陈宝箴《致张之洞》(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二日),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下册,第1597页。

④ 参见张之洞《致长沙陈巡台、黄臬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午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315页;《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81页。《陈宝箴集》的编者将张之洞来电系于“闰三月十七日”(下册,第1600页),不知何据。

张之洞出身鼎甲，早年以八股文名动科场，在科举与学堂尚未势成水火之时，不便于尝试“过河拆桥”的举措（张后来参与停废科举，被认为是“过河拆桥”之举）。这与他调整科举乡会试的场次格局，又尊崇四书五经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在维新风气高涨之际，五月初七日，陈宝箴致电张之洞：“朝政方新，前示改科目议，似宜速上。”两天后，他对张之洞以《劝学篇》中所拟办法为蓝本起草的奏稿提出自己的意见，称：“科举如《劝学篇》所议极善，惟愚意不废八股则学者难捐旧习，志意不专。若主试者仍有意偏重，则首、二两场皆为剩义。似宜用《四书》《五经》命题，革除排比词藻，既可阐发圣贤精义，又足潜移默化，悦人心志，庶几拔本塞源。”^①由此可以看出张之洞、陈宝箴在变科举主张上的异同。

经陈宝箴再次提示，张之洞似乎才意识到“废八股”的重要性，表示“极佩，透澈之至”，改革为“废八股，改为四书义、五经义，其文体略如讲义、经论、经说，一切拘牵俗格、苛琐禁忌，悉与删除”^②。如此一来，张之洞变革科举的方案便完成了从不提及废八股到主张废八股的转变。

张之洞的态度转变，实质上应与朝廷的政令趋向有关。就在张、陈二人反复商议之时，张之洞从盛宣怀处获悉即将有“下科改试策论”、废时文的上谕。因此，他也将废八股纳入科举改革之中。不过，他仍坚持必从场次入手，“即令如盛电三场皆有改动，然必如《劝学篇》所论节目，乃为尽善”。因上谕“只浑言策论”，故而张之洞最终坚持新章的第三场仍“用四书义、五经义，其文体大略如讲义、经论、经说，准引史事群书，专用四书、五经原文命题，以免废弃经书”^③。

从“文”更为“义”，仅是一字之差，在是否用八股体式的差异上，四书义与五经义似乎回归到“经义”这一科举文体的最初形态。需要澄清的是，“四书义”“五经义”的名称，并非陈宝箴的独创，此前已有士人以此称呼科举中考试四书和五经的文体。在经历数百年的批判之后，“八股”从科举中废除，四书文和五经文却通过“正名”之举，改头换面，以“四书义”和“五经义”的名目继续成为王朝选才取士的标准。

另一方面，四书文（义）所在场次的差异，对于它们在科举抡才中的地位与作用有着迥然不同的影响。在偏重头场的风气下，四书文是选才的首要乃至最重要的标准；张之洞意图改变这种风气，主张分场去取与发榜，将第三场作为取中与否的关键，所以才将四书义与五经义定位在第三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初一日，光绪帝接受了张之洞和陈宝箴的科举变更之法，认为“先博后约、随场去取之法，将三场先后之序互易等语。朕详加披阅，所奏各节剴切周详，颇中肯綮，着照所议”。科举乡会试仍定为三场：

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首场按中额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取者始准试次场，每场发榜一次。三场完毕，如额取中。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时务策命题；正场试以四书义、经义各一篇。^④

尽管戊戌政变后科举考试恢复旧制，但是辛丑改制后的新章，仍沿用了张之洞与陈宝箴协商确定的科举文体格局，只是张之洞的联衔会奏者由陈宝箴变成了两江总督刘坤一。较之戊戌上谕所不同的是，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的上谕只采纳了科举考试各场的文体格局，却摒弃了分场去取与发榜的程序。

张之洞十分不解科举分场去取的程序为何在这一次未能得到朝廷采纳，于是电询身在西安行在的

① 陈宝箴《致张之洞》（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陈宝箴集》，下册，第1602页。

② 张之洞《致长沙陈抚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十日戌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326页。

③ 张之洞《致长沙陈抚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329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册，第251页。

军机大臣鹿传霖：“科举三场不分场发榜，去取不难认真。”“（此事）十分紧要，鄙人拟再陈奏。公卓见如何？”似未得到满意的答复^①。九月三十日，他再次联合刘坤一上折申明此意，得到政务处诸臣的答复：“原电恐主试者有所偏重，惟分场去取亦不免仍有偏重之弊。科举甫经改革，一时亦难遽得全才，应俟学校大兴，人材辈出，再行斟酌办理。目前仍宜三场合校，无庸更张。”^②在没有扭转偏重头场的科举风气下，处于乡会试第三场的四书义与五经义，其地位、作用以及受应试士子重视的程度，无疑都被降低了。

二 文体蜕变

科举新章中四书义与五经义的命运与地位，被外界人士不同程度地曲解、误读。最严重的一种曲解即是，将废八股与废四书文、五经文同等视之，甚至误以为四书五经退出科举考试了。从“文”到“义”，除了八股体之外，其他文体形态上的差别似乎尚无专门的论述。

从命题上来说，取材仍是四书与五经，只是命题格式略有不同。如四书文与五经文常摘其中某一句、一段、一章来命题，且不会在题面后加“文”字；四书义与五经义，则于摘取的一句后加“义”字，即以“××××义”格式命题。

需要注意的是，此前，顺天乡试及会试的四书题均由“钦命”，在更定新章之后，四书义移于第三场。为了慎重起见，礼部诸臣以为顺天乡试及会试的“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题，仍请钦命，庶于讲求实学之中，仍寓崇尚经术之意”，至于其他省乡试的四书、五经题，则由各省乡试考官自行拟定^③。这一沿袭旧制的做法，所谓“仍寓崇尚经术之意”，或许是希望以名义上“钦命”的皇权余威减轻四书义、五经义降为第三场文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在晚清多幼主以及当时光绪帝自身难保的清末政局中，所谓“钦命”试题已是众所周知的虚文。据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会试录可知，考官在奏报各场考题时，为了突出“钦命”题的地位，特地先书第三场题目，然后才书第一场和第二场题目^④。礼部“崇尚经术”的制度用意，似乎远不如张之洞提出的分场去取更加有效。

至于在废八股之后，四书义与五经义应采用何种体裁，官方似乎并未进行严格的界定。早在光绪二十四年废八股之际，已有官员指出，“我朝以制艺取士，首正文体，故高宗纯皇帝《钦定四书文》一以清真雅正为宗，俾士子有行矜式。今钦奉谕旨：改试四书、五经义，文格与制艺迥别”，请旨精选“历代及国朝名儒名臣四书五经讲义若干卷”，经钦定后刊刻颁行，“则应试者既遵循有自，衡文者亦去取有资”。光绪帝则主张先儒讲义各书，由各省学政自行择优购选，分发应试士子揣摩讲习^⑤。

至辛丑改革，政务处与礼部拟定的章程作了几方面规定：一、四书义与五经义“宜朴实说理，参取讲义、经说之意，阐发无遗”。至于是否采用讲义、经说之体，亦未明确规定。二、厘正文体之法，

①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② 礼部纂辑《续增科场条例》（自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湾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49辑第486册，第2483页。

③ 《续增科场条例》（自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第486册，第2511—2512页。有意思的是，外界舆论所刊的《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万国公报》光绪二十七年第156期）却无此条规定，不知是无心之失，抑或有意抹杀？

④ 《光绪三十年会试题名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杂档，档号：409000122。

⑤ 《安徽学政徐致祥片》（光绪二十四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210-013，缩微号：537-2573。

既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又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这专门举出骈俪体与怪涩体为规避对象,显然是担心四书义与五经义仍蹈此前时文的弊端。三、文章写作不入口气,即不再代圣人立言,但是“仍不准阑入周秦诸子谬论、释老二氏妄辨、异域方言、报馆琐语,一切离经畔道之言悉当严加屏黜”。四、至于如何示士林以衡文准则,则由乡会试“考官选刻魁卷,每场试艺应择尤刊刻,以为标准”(《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这意味着四书义与五经义的“标准”,尚须在接下来的科举考试中逐渐形成。

综合来看,从四书文、五经文到四书义、五经义,破旧仍未彻底,立新亦未成型。不久,贵州学政赵惟熙咨称,既然四书义与五经义不入口气,“似可援用后世子史诸书,考先正各义,多有以命借证时事者,拟请稍宽其格”。此外,诸如“凡经四库著录之子史别集均准引据,亦可泛论时事”。

礼部诸臣对此并不以为然,称四书义与五经义理应“恪遵先儒传注及御纂钦定诸说以为立言宗旨,即令荟萃群书反复推阐,而体裁谨严,亦不得稍越范围”。如果四书义、五经义允许泛论时事,不免“逞臆妄议,抛荒本言,于体裁殊有不合。至子史别乘中精粹纯正之言,采取原所不禁”。总而言之,该文体务必遵照原奏定章程办理^①。

从四书文到四书义,两者在文体形态方面的整体与具体的差异,还可以通过类似题目的不同文章来进行比较。如〔表1〕(见下页)。

通过文本比较,不难看出,四书义在行文中仍有许多方面难脱八股旧习。尤其突出者,如行文中多处采用对仗句,以及类似于“提比”处的“且夫”字眼,显然是被称为道光以来乡会试场秘诀的“且夫调”的旧习^②。

可是,四书义较之四书文的文体蜕变,亦不容忽视。首先是字数。四书义在字数上的局限略宽松,较之类似题目的四书文多了一百多字(四书文444字,四书义584字)。其次是行文的口气。四书义“不入口气”,故而行文方面所受拘禁较小,尤其是采用问答辩诘式的行文,使得理据更加贴切。最后是引证。四书义不似四书文完全发挥圣贤义理,而是引证相关史事以证圣言。如〔表1〕的四书义专门征引三代及春秋史事以证孔子之言的本旨,甚至引后代帝王治国之策发挥孔子之言的奥义,这与此前四书文不引两汉以来书籍史事的风格有着质的区别。

尽管在破旧与立新两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可是对于原本正在学习八股文的应试者而言,已经不啻于彻底的解放了。时为童生的朱峙三后来称:“自改策论后,予作文如脱羈之马,笔势开展奔放,已不受八比文之种种法制束缚,思想所在,运笔自如。”^③

其实,从八股文到四书义、五经义的转变,应试士子在写作训练和应试技巧方面同样存在不少异同之处。如光绪二十七年上谕废八股之后,尚未获知这一消息的童生朱峙三等人,仍在日日研习分股作文,师生的对策是,“科举恐要废八股,改策论。如有上谕,我邑各私塾不授八比文矣”。自获闻确切消息后,“俱作义、论”。至于揣摩之法,则同样取资于古文,尤其是“以后每夕读《古文观止》”,“每日读一篇,如从前读八股文然”,此前熟读的八股文均停止不读^④。

在《小题正鹄》之类的八股选本不再适用应试之后,书商们也迅即寻觅一些可供四书义等文体应试的素材(尽管此时科场书的出版重在策、论)。在利益驱动之下,一些原本不受重视的另类四书注本,在科举新风气中开始崭露头角,例如光绪三十年(1904)上海宏文阁印的《四书义史证》。该书

① 《礼部复议科场事宜》,《万国公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第162期。

② “且夫调”,盛于道光以后,“其法于提比之后,或末比之前,突用‘且夫’二字以振其势,并不顾前后语脉。乡会试场以为秘诀,以文言之,不通甚矣,聊以自文其陋而已”。参见卢前《八股文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3—94页。

③ 胡香生辑录,严昌洪编《朱峙三日记(1893—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④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89—92页。

文体	四书文	四书义
题目	敬事而信三句	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义
出处	《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章	《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章
作者	张志栋，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	金兆丰，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
正文	<p>道国之经有五，而本计得矣。夫敬、信、节、爱、时使，皆本计也，道国者可不勉哉！尝谓致治之术多端，而善为治者必进而详其体要。所存惟严以贞一己之志，而宽以联万物之情，斯本计得而国家乃可久安而长治。千乘何以道哉？其首在“敬事”，治道之升降视几务之修废以为端，而小心者大业所由集也，道何可不敬，喜事者易荒，持其衷者以慎，畏事者易废，厉其志者以勤，则国无废事矣；而次又在“信”，化理之盛衰视政令之烦简以为量，而纷更者疑贰所自生也，道焉可不信，酌理势以垂道揆，信以义而起，规久大以昭法守，信以诚而贞，则国无繁令矣。其次又在“节用”，月要岁会，无不下取于闾阎，苟俭约未至，非所以重民命也，即非所以重国储，节焉以不得不用者尊王制、以不敢过用者清君心，则理财之道得矣；而次又在“爱人”，百官万民，各思上通于黜座，苟体恤未周，非所以固人心也，即非所以固国本，爱焉而辅吾治者有礼以相接、而待吾治者有恩以相维，则御下之道得矣。虽然，政教修者国必强，仁俭至者国必富，履丰处盛而军役烦兴、旷农废业，其累盛治者岂少哉？道在“使民以时”。下既以裕胥胝之力，上亦以杜浩大之萌，则国无过举矣。凡此者皆本务也，道国者审诸？^①</p>	<p>有治国之法术，有治国之精神。精神不可见，见之于戒惧，见之于不欺，见之于俭且仁。之数者，皆心法也。三代上有心法，故天下但见圣人之精神，如尧之钦明，舜之允塞，禹之无间，文之怀保惠鲜。是三代下无心法，故天下恒苦诸侯之法术，如鲁之怠玩，晋之诡譎，齐之奢侈，桧之政繁赋重。是夫子目击其弊，而告道国者以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殆欲以心法之精，救治法之坏欤。且夫敬者，非凝旒垂纆之谓，必其君无自逸之心，而后成其为敬。信者，非信赏必罚之谓，必其君无役智之心，而后成其为信。节用爱人者，亦非朴陋姑息之谓，必其君有不敢纵欲、不敢戕物之心，而后成其为节与爱。开创之主以此四者为国脉，守成之主亦以此四者为枢要也。分言之，曰戒惧、曰不欺、曰俭与仁；而合言之，则皆心法也。或者曰：后世非无行之者，仁宗修警以答天贶，文侯往猎以践会期，文帝罢台惜费以示敦朴，景帝复田减法以务慈祥，国亦何尝不治？而识者曰：此不足以为敬信也，此不足以为节爱也，即敬信节爱，而犹其迹也。道国者务使洞表达里而无所间，从体合用而无所格。而后存心恪，下无戏渝之臣；立意诚，内无嚣张之习。嗜欲寡，德泽溥，天下无侈靡之风，并无焦枯之患。夫岂无国运衰者，赖敬信节爱有以持之也。且此四者，尤非可据迹以求之。兢业者敬也，有时倦勤者亦敬；必达者信也，有时行权者亦信。省费者节也，有时义所当为，即不蠲费而亦节；生人者爱也，有时义不容已，即偶戮人而亦爱。此贵乎探其本原，与随其时而调剂之。夫惟圣王在上，履若春冰，坚如金石，体唐成俭，踵虞为朴，家泯君牙暑雨，俗闲姬旦幽风。观治者以为治法之懋也，而不知消焉息焉，君心而已矣。是以孔门重心法也。^②</p>
点评	非无绚烂之章，检其句语，不落郭郭，即入拙滞。转取此切近明显者。	六通四辟，题无剩义，词严义正。

〔表1〕

以袖珍本印行，共六卷，四册，其中《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孟子》各两卷。全书仿照命题格式，或单句、数句，或一节、一章，援引书籍进行释证。作者谭义（字燕山，广东茂名人名）似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读书人，于是宏文阁弄了一篇光绪十三年（1887）广东学政汪鸣銮所作的跋文，置于全书之首，显然是向广大应试士子推销的重要手段。汪称：“谭君是书取四书所言，证以史事，穿穴贯串，具有识解，不仅读书作文之益，实知人论世之资也。……征引繁博，参观互证，亦足以圣贤立

① 方苞编，王同舟、李澜校注《钦定四书文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0—681页。

②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8册，第231—233页。

言之旨相发明。”^①如《孟子·离娄上》的“上无礼下无学四句”，则称：

置五经博士，北魏之所以兴也。广三舍生员，大唐之所以盛也。秦弃礼义、焚诗书，而陈胜吴广之奋呼，即召咸阳之火。宋废《春秋》、禁道学，而宋江杨大之余孽，终扬崖海之波。晋穆帝罢遣大学生徒，遂至羌羯五胡迭乱中国。明熹宗诏毁天下书院，卒至张李二贼，倾覆神州。故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四书义史证》卷六，第2a页）

综观全书，诸如此类者比比皆是。可以说，该书实际上是取中国历史人物的言行史事，与四书中的微言相互参证，这无疑是为了便于应试士子作四书义时取材。

此外，朱峙三还提到变革科举文体之后作文练习方法的调整，称老师训练士子作义、论诸文，“所作俱为整篇，非如八股分半篇、中股、完篇也”^②。这或许是作为八股初学者来说，在废八股后所能感受到的最深刻的变动了。

三 新章的落实及反响

新章颁布正值辛丑年，即乡试年。虽然因动乱及条约等限制，多省的乡试未能举行，但是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个别省乡试却如期举行。由于新章声称“自明年为始”，因此这几省的乡试仍采用了旧章。

时任贵州辛丑科乡试副考官的华学澜，七月三十日行抵贵阳后，始知“上谕又变通科举”，自壬寅科始，“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章式”。于是，他和主考官一方面按照旧制，首场出四书题三道、五言八韵诗一道：“四书题：子曰事父母几谏一章；贱而好自专一句；为天下得人难一句。诗题：寒山远水江村暮得寒字五言八韵。”次场五经题：“《易》题：通其变至使民宜之。《书》题：元首明哉三句。《诗》题：于铄王师四句。《春秋》题：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郟，晋师败绩。《礼记》题：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备用利器。”另一方面，则于第三场的策问用意拟题：“一问天文算学，二问农政，三问矿务，四问军械，五问贵州地理水道。前四问均及西法。”他与主考官于西法仅略知皮毛，却仍以开风气为己任，特地拟了四道与西法有关的策问题。至于旧例奉行已久的选刊八股闱墨事例，他们限于身体状况，以及已废八股的新政令，决意不必多刻，“所以头场文余只发刻十篇，二场文只刻一篇而已”。他们深知“明岁即不考制艺，此次为八股末运，不能不刻闱墨以存名目，谁其如从前之悉心揣摩哉”^③。这表明，华学澜意识到本科八股已为末运，选刻本科闱墨的举措不过是因循了事的成例。换言之，这批闱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亦如朱峙三等人所说，是一种“纪念”^④。

与华学澜等应付旧制相反，辛丑科广东乡试的考官则墨守旧规，引起一些趋新人士的批评。时论称：广东乡试发榜之后，“所取人士诚属八股好手，若在咸同之时，则此科主试可称得人，所惜者朝廷已下废八股之诏，两主试非无闻知，乃其抡元定魁，亦依然以臭墨体裁许为清真雅正，而置之前列。凡属有心经世之士，即使房考力荐其卷，亦属屏弃不取，间有情面难过者，仅在取中之列，而前茅则非其选也”^⑤。科举改章的初步落实状况，也给部分应试士子带来些许暗示，以为八股未必即废，在不久之后有可能重新恢复，揣测与彷徨之情，兼而有之（参见《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

然而，废除八股，改试西方政治艺学策、中国政治史事论及四书义、五经义，这毕竟已成既定事

① 汪鸣銮《谭燕山〈四书义史证〉》跋，谭义辑《四书义史证》，上海宏文阁光绪三十年（1904）石印本。

② 《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91页。

③ 华学澜《辛丑日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4、122、125、127、132页。

④ 朱峙三记：“师言八股势在必废，欲予将八股学成完篇，亦纪念也。”参见《朱峙三日记（1893—1919）》，第90页。

⑤ 《八股尾声》，《台湾日日新报》，1901年11月21日第3版。

实。执掌文衡者不论情愿还是不情愿，均能够遵循新章来考课应试者。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有的官员还专门颁布告示，将科举文体变革的缘由晓谕士子，称：

钦奉明诏：废八股，试策论，而先以四书义、五经义为根本，有志之士咸思挟术自献，扬于王庭，顾操之无具，则择焉不精，变本加厉，其害有数。现当童试，愿与多士告之。

经义与八股，似同而实异，俗儒徒知窃取八股文字，不入口气，即以为可充作经义。不知八股中恶劣字眼，断断不可入文。至高头讲章，既无当于圣言，更有戾于经旨。经义必须涵今茹古，挟经之心，执圣之权，而又剴切详明，无幽不烛，必胸有宋五子，而后可以抒写四书之菁华；必阅遍廿四史，而后可以发抉五经之大义。为文首戒敷衍，次忌冗长，出语贵于浑含，摘词要在无儒。往日所读墨卷、考卷，以及经文种种，譬如忽经秦火，一扫而空。诸生当知有所弃，方能有所取也。

策论亦非一端可尽，有论古之论，有救时之策。其论古者，大端不外乎经史，而考究掌故，则非熟悉本朝典章政要，几有难于下笔之势。读书在于平时，断制决于一日，平时无真知灼见，临文安能切理履心。倘如北辙南辕，背日求景，枝枝节节而为之，岂士君子敦求古谊之意乎？泰西时务新书，杂出互见，既欲讲求西学，必须先从其浅近处入手，由普通之学以进于专门，习之有年，始能言之有要。若其钞袭夹带，掇录报章，或知其一事而未究其会通，或侈为狂谈而莫衷诸至当，用夷变夏，殆更疚心，救时之彦或不出此。

要之，未废八股以前，士子尚可墨守旧习，以一文一诗为生活。既改科举以后，第一在多读经史，第二在讲求时务，读经史以广识略，讲时务以博见闻，而操笔为文，则经义、策、论与八股文字有不可同日语者。有好笔仗以达之，而后新义以出，新理毕呈，非枕藉于老苏、荆公之文，不能有警切动人之作。即或绍桐城之遗派，挹方、刘之余波，亦必笔气遒古，方可抒厥蕴蓄。诸生须于古文中求之，勿谓兹之试士与昔比伦，蹈彼故常，不思改计。目今变法伊始，科举从宽，本县于诸生初不敢为过高之论，而未尝无至厚之望。今何时耶，有志者自勗云尔。特示。^①

该告示可谓是剴切详明，一方面辨析了四书文、五经文与四书义、五经义之间的文体差异，指出了此次改革不仅仅在于废除八股和“不入口气”，更重要在于“必胸有宋五子，而后可以抒写四书之菁华；必阅遍廿四史，而后可以发抉五经之大义。为文首戒敷衍，次忌冗长，出语贵于浑含，摘词要在无儒”。另一方面，又指出改试策、论，“有论古之论，有救时之策”，论古之论在于经史与本朝典章，救时之策在于泰西新书。总而言之，科举改章之后，此前应试者依靠一文一诗（即乡会试首场的四书文与试律诗）即可掇拾功名的时代已结束，此后须“第一在多读经史，第二在讲求时务，读经史以广识略，讲时务以博见闻”，如此操笔为文，四书义、五经义、策、论与八股文字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始，各省学政职司的岁科考试开始全面实施新章。山西学政刘嘉琛奏称，自获读科举改革的上谕后，以为“若骤试以经义，则未谙体例，必仍蹈袭庸滥之弊”，于是变通办理，“二十七年以前岁试正场，仍试以四书文、经文、试帖，自二十八年为始，一律改试四书义、五经义”^②。江苏学政李殿林采取类似办法，在二十八年之前，“正场文体暂仍其旧，而朴实说理，颇知研究精义，预为改试新章之计”，次年正月，“各属生童正场均改四书、五经义各一篇，不准用八股程式”。安徽学政宗室绵文亦于该年正月奏报，“遵旨改考论、策、四书义、五经义”^③。其他省

① 庄纯斋《卢乡公牍》卷二《示谕校士馆生员科举改章办法条告文》，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9册，第579页。该文的时间标为“庚子冬月”，据内容判断应为“辛丑冬月”。

② 《山西学政刘嘉琛奏为岁试省南东路路安府等处及太原府等借棚考试情形事》（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号：04-01-38-0177-029。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5辑，第149、138页。

学政落实新章的时间或有早晚,成效与反响各有差异,却都不约而同地在岁科考试中实施科举新章。因为这一年即将举办科举改革以来的第一科(壬寅科)乡试,随之而来的是癸卯科乡会试、甲辰科会试。

当时已为秀才的陈垣,曾经研读闱墨,揣摩八股“法度格调”,“庚子、辛丑科岁两考皆冠其曹,即其效也”;至参加改革后的乡试,“迨壬寅借闱汴梁,改试策论,前功遂废”^①。所谓“前功遂废”,或许可以从两方面解读:一是积极方面,即科举考试改革彻底,八股文章已难奏其功,并未延续到西方政治艺学策、中国政治史事论,甚至是四书义、五经义等新科举文体之中;二是消极方面,他在回忆中专门强调策论,而不言四书义、五经义,或许反映出在衡文者与应试者看来,第三场对于取中与否似乎无足轻重了。

无独有偶,壬寅科中举人、甲辰科中进士的金梁也曾自嘲称:“余乙未入学,壬寅中举,甲辰成进士,可称八股秀才、策论举人、末科进士。”^②由此亦可看出,至少在应试者眼中,在废八股以前,科场风气是以头场的四书文为取中与否的关键;废八股以后,则以头场、二场的策论为根据,对于第三场文体则阙而不言。

在衡文者看来,四书义与五经义在乡会试中的没落同样是不争的事实。癸卯科会试同考官恽毓鼎亲历其事,记第三场的“钦命题”:一、“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义”,题出《论语》;二、“故为政在人,教(取)人以身义”,题出《中庸》;三、“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诸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义”,题出《易经》。题虽出自“钦命”,却囿于衡文与考试程序,丝毫未彰显出崇尚经术之意。恽毓鼎认为,对于应试者而言,“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对于衡文者而言,“以为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③。

很显然,由于张之洞所主张的分场去取与发榜程序的缺失,所谓兼顾三场仍为虚文。由于阅卷时间紧迫,乡会试考官往往仍然偏重头场。受此影响,作为乡会试第三场的文体,四书义与五经义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明显降低了,自然也无法引起应试士子与衡文者的重视。上谕反复强调的“合校三场,以定去取”,在那个未采取分数制的明清两代,大体上均流于纸上空文,难以见诸实施。偏重头场本就是数百年科举考试积累形成的风气。这从衡文与应试的风气可见一斑。

正是基于四书义与五经义在科举考试中的失势情形,不少被今人目为保守的官员担忧,“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学术人心,可忧方大”。他们指责张之洞变革科举,甚至停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恽毓鼎根据参与癸卯科会试的衡文经验,自拟乡会试改革办法:“乡会试宜改为两场:头场试史论三篇,在正续《资治通鉴》内出题,时务策两道,不拘中西;二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二篇。阅卷者两场合校,精力既觉宽余,次场便可着重救不读经书之失。”(《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21页)删繁就简,确实不失为一条改制良方。

恽毓鼎等人身处局中,也未必能够准确把握新章的出台过程与本意。殊不知,清末科举新章恰恰是抽掉了张之洞最重要的分场去取、分场发榜的主张,从而导致新章的落实与反响,既无法满足趋新人士的期望,又难以契合保守人士的尺度。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具体制度设计之一,张之洞所倡导的选才标准与取向,亦无法付诸实践。

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加之科举新章的受挫,张之洞最终被袁世凯、端方等督抚说服,加入奏请立停科举的行列(参见《清季科举改革与停废科举》)。

①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130页。

② 金梁《光宣小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③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册,第220—221页。

四 余 论

综上所述,如果从科举考试的变革用意与实际成效的层面来衡量,四书义与五经义显然未能成为张之洞等人所寄望的选拔通才与专才的重要标准,最终几乎沦为科举新章的点缀。就此而言,清末废八股后的四书义与五经义在科举考试与时局中的地位与命运,不过是科举考试乃至大清王朝在近代变局中的一个鲜明的缩影罢了。

然而,若从文体正变的层面来考察,四书义和五经义摆脱了八股程式的束缚,废除了代圣人立言的行文口气,可谓是文体上的一大突破。这种突破甚至有更多的学术意义,如四书义和五经义在引证上得以综合比勘各种史事,与近代学人所推崇的理解圣人言行的学术取向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陈寅恪为杨树达《论语注疏》作序称:“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① 曾为清末士子的杨树达,在晚年以此法注疏《论语》,是否与早年读书应试四书义的情结有着微妙的关联呢?只是他注疏《论语》的视野,“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很可能是借鉴了长编考异之法,较之四书义的取向无疑更加博大精深。

[作者简介] 安东强,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发表过论文《〈钦定四书文〉编纂的立意及反响》等。

(责任编辑 马 昕)

^①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注疏〉序》,陈美延主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2页。